

大里先生的上海情缘

陳 祖 恩

二〇一五年三月，大里浩秋先生因满七〇岁而要在神奈川大学退休了，但在我的印象中，他依然是那样的神采飘逸、充满活力、没有丝毫的老气暮年之感。

岁月悠悠，结识大里先生已近二〇年了。初次会面，是在小生任职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大里先生出身于以美人闻名的秋田县，毕业于著名的东京大学，能说流利的汉语，谈吐幽默风趣，是有大人气的学者。与一般日本教授的西装革履不同，大里先生身着休闲上装、圆领衬衫，不系领带，古典而优雅，富有亲近感。自此，每年在上海都有机会与来访的大里先生会面。有时，一起去青岛、烟台、威海等地考察，或利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在东京、横滨、长崎、仁川等地会面。

二〇〇二年，大里先生来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进行为期一年的访问研究。当时，历史所藏有宗方小太郎日记等珍贵史料。一九八〇年代，有人曾对日记进行过一些翻译和整理，但由于学力和语言理解能力等因素，并未能进行实质性的研究。大里先生在上海访问研究时，在中方许可的范围内，对一部分日记进行了拍摄整理工作，这可能是第一位真正触摸宗方日记原本的日本学者吧。此后，宗方日记作为重要历史宝藏才开始引起历史研究所

的关注。一二年后，甘慧杰先生^终于完成宗方日记的整理翻译工作，并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同年夏天，在大里先生提议下，我得到日本横滨市国际交流协会的资助，在神奈川大学作为期半年的访问研究。大里先生虽然在上海，但他尽力给我提供各种有利的研究条件，包括自由进入他个人的资料室、毫无保留地提供他多年收藏的中、日文书籍和史料。同时，还委派事务所两位职员专程为我导游横滨、参观山手町、岸根公园、原跑马场址、三溪园、横浜信号塔、国际会议中心等代表性景点，还在邻芳园品尝了横滨的特色料理。

大里先生在上海访问研究期间，除了学术活动外，还经常参加上海日本人的历史散步会活动。该会由时任上海日本人学校事务局的片山泰郎先生任会长，始于二〇〇〇年一月。历史散步会活动几个月举行一次，既有上海的中西老建筑，也有很多日本建筑，既有国际都市的繁华景象，也有一般日本人难以见到的城市风景，如露天菜场、穿睡衣在大街上行走的女性、修理自行车的车摊、理发摊、缝纫摊等，真是百闻不如一见。作为历史教授的大里先生与在上海生活的日本公司职员、中小學生、家庭主妇等一起活动、聊天，加深了现地日本人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了解和理解。

二〇〇七年，拙著《寻访东洋人》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本书原是为中国读者而写的。但是，本书出版后，引起一些日本读者的兴趣，上海历史散步会一些会员希望本书能在日本出版，一些原日本居留民及其后代在访问上海时也表达了同样的愿望。大里先生获知这些信息后，立即领衔组织翻译团队，以历史学者的深厚功底和精湛的日文为本书翻译，并校正了中文版的一些错误，最终，日文版以《上海に生きた日本人——幕末から敗戦まで》的书名由大修馆书店出版。

从所周知，以大里先生为代表的^为神奈川大学租界研究中心具有从历史与建筑这两个不同范畴对租界进行研究的

特色。无论是收集档案资料还是遗址考察、历史学研究者经常与建筑学研究者同行。学科的互动，深化了历史与建筑的关系，也深化了租界与都市的研究。近年来，神奈川大学租界研究中心在中国、朝鲜、日本的租界史研究方面取得显著的成果，其不仅在上海、仁川、横滨等地多次召开以东亚租界研究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还先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文版的《租界研究新动态》（二〇一一年）和《近代中日留学生史研究新动态》（二〇一四年），受到读者的好评，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是，在上海的学术调查工作也并非都是容易的。有一年夏天，大里先生和神大一些老师来上海考察日本纺织工业的建筑。当时，由于中日关系的恶化，在考察澳门路的内外棉职员住宅时，遇到一些冷脸，也有一些阻力，一些老师不了解中国的国情，依照日本的方法进入小区进行考察，大里先生由于有在上海生活的实际经验、观察到这种情形，及时调整，用适应中国社会人情的方法完成了考察。那次活动结束后，当大家行走到中山公园附近时，天气突然变脸，下起大暴雨，我们尽管在凉亭下躲避，但经不住狂风暴雨的肆虐，浑身湿透。当天晚上，大里先生依然诙谐幽默，但比平常多喝了几杯酒。人生甘苦，尽在杯中吧！

大里先生曾在历史研究所作过一次演讲，其中谈到年轻时代的激情岁月，与我在文化大革命时代的经历有相似之处。烟云散去，便是江湖人生，友情是特别重要的。我们会面，不会清茶一杯而尽，而要以酒尽情尽兴。有一年在大里先生位于逗子的家里，深夜醉酒而归，留下难忘的记忆。近年在长崎相遇，一次酒会，百多人；二次酒会，数十人；三次酒会，唯有大里先生与小生两人。

也是深夜，在长崎的小酒店里，两人对酌，耳边传来桂银淑沙哑而富有磁性的歌声，好像是《大阪暮色》吧！
没有醉意，只有情意！

二〇一四年一月於上海